

经济转轨期农村经营模式: 路径、绩效与创新

徐 涛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徐 涛(1972-), 男, 湖北宜都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以及企业理论研究。

[摘 要] 目前, 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的弊端在于土地难以流转、经营规模太小、市场联系面窄、抵抗风险能力弱、农业资本投资不足、土地使用效率低等。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 就必须创新经营模式, 下一步应该把突破口放在以产权清晰为基础的统一经营上, 建立农村家庭、涉农企业、集体和政府利益协同的产业链, 把重点放在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环节, 以企业为龙头, 建立大市场大流通, 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关键词] 农村经营模式; 演化路径; 绩效; 体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 F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6)02-0186-05

经济转轨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化, 也就是经济市场化的过程^[1](第 3 页)。在经济转轨期, 改革和发展是经济工作的中心环节。对中国农业而言, 经济转轨期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促进传统农业方式向专业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的现代农业方式转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 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 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 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 要积极探索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的实践形式, 实现中国农业健康和持续发展并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一、经济转轨期中国农村经营体制的演化路径

(一) 中国经济转轨期的进程和特点

中国的经济转轨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迄今为止 20 多年的改革进程中, 中国经济转轨是一个连续变化的、不断深入的过程, 是渐进式的改革。转轨期的基本特点: 一是由“排他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制”, 进而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目标不断调整, 逐渐明确; 二是改革的过程中采取双轨制, 即对资源配置实行的计划调控与市场调控相结合; 三是改革采取“先农村后城市, 先增量后存量, 先点后面”的层次推进方式。

(二) 转轨期中国农村经营模式的演化路径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国采用了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在经济发展和选择工业化道路上基本上照搬了苏联模式, 强调工业化优先, 尤其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为了确保所需要的巨额原始积累资金, 国家一是运用行政手段实行统购统销, 压低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 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隐蔽性地将农业剩余从农民手中转移出来; 二是通过实行城乡隔离, 使农村人口享受不到政府给予城市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农产品价格等方面的优惠, 使城市工业化的高成本很大部分又被转移到农业

等传统经济部门中^[2] (第17页)。这种方法虽然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了巨额资金,在中国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也同时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抑制了农业的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进入转轨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为把农业搞上去,首先在农村实行改革,推行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家庭承包责任制把农户家庭确立为农业资源配置和社会秩序优化的基本组织单元,较好地解决了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土地的产权问题,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合理的制度创新大大刺激了总产出和剩余产品的增加,使农民有了将自己所得的剩余产品再行投资并逐步形成自有财产的权利,事实上重建了农民所有的财产权利。

这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不仅赋予了农民自己的财产权利,还相应地扩大了农民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不仅是从事农业活动的自由,还包括从事非农产业活动的自由,进而扩大了改变社会身分的自由。1978年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逐步解除了原有体制对农民经营自由的重重禁锢,从肯定多种经营方针、明确社队企业地位、承认多种经济形式的存在、允许土地转包、繁荣小城镇政策,直到允许经营权的流转、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等。改革带来了过去几十年不可想象的方向性转变,唤起了几亿中国农民对土地、劳动和生命的热爱^[3] (第172页)。

二、经济转轨期中国农村经营模式的绩效评价

(一)农村经营模式的正绩效

创新是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Schumpeter, 1961)。中国实行的农村经营体制的核心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双层经营体制,即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使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集体统一经营层与家庭经营层相结合的经营体制,农村家庭成为独立的经济核算经营单位。经营体制的创新极大地释放了农民长期以来压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第一,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少,适合劳动集约的精耕细作方式,新的经营体制的实行提高了土地生产率;第二,家庭经营使农户获得了剩余索取权,农户的利益直接与其生产经营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第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户逐渐成为农业生产、投资、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劳动者即农户能获得自己劳动努力的全部边际报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第四,随着农村商品市场的初步形成,家庭经营可以适应市场所需求,它具有灵活的信息决策机制,能够在预见和规避风险上迅速做出决策并付诸行动。市场机制在配置农村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中也得到了广泛发挥。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改革充分认识尊重了农业生产难以实现有效监督、劳动质量难以准确度量等特殊情况。最成功之处就是赋予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为核心的私人财产权,从而确立了农户的经营自主权、产品支配权,让农户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获得了更广泛的自由参与权。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使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合一,生产经营与家计安排合一,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建立在血缘、亲缘基础上的和谐关系又大大降低了监督成本,所以家庭经营能较好地满足农业生产的要求。

从开始改革后的1979年起,中国农业取得了超越历史、超越常规的发展速度。有关研究表明,1979至1987年中国农产品的总产出增长中的46.89%是源于家庭承包经营改革的贡献^[4] (第76页)。农村双层经营模式在土地制度、生产经营方式、农户财产权利以及身分自由等方面所取得的制度性重要成果,构成了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最可靠的现实支点,而且为更长远的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制度方面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5] (第329页)。

(二)农村经营模式的负绩效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这种小农经济的传统生产模式越来越显示出弊端,在家庭承包经营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决定了农业规模分散经营和土地细碎化的分配格局。第一,由于体制障碍及

条件限制,土地难以流转,使得一家一户式的过分狭小而分散的经营规模很不经济,阻碍了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动力及农业固定资产得不到充分利用;第二,家庭经营耕地规模太小,在农业科技水平和其他自然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活劳动投入对农业生产的边际贡献率逐渐降低,在达到极限水平后,“精耕细作”就很难再对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起作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将遭受挫折,农业生产的增长将重新陷入停滞。因此,在现有耕地水平下,过小的家庭耕地规模,不仅大大限制了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加大农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农业不能产生规模效应;而且会进一步造成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化,阻碍规模作业,不利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最终会成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巨大障碍。

2. 与市场联系面比较狭窄,分散的小农户难以抵御市场风险。由于广大农户成为一个个独立的经营单位,就必须承担农村经营相应的一切风险,包括自然风险、投入风险、财务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等。因此,在农村经营过程中普通的家庭农民不仅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栖”,进行田间地头的日常劳作,还要充当家庭经营的“股东”(享有剩余索取权)、“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管理)、“总工程师”(负责农业技术)、“总会计师”(负责财务核算)、“总经济师”(负责投资控制)以及“营销总监”(负责市场营销)等等。由于以散户为单位的农民了解市场信息的渠道不够通畅,再加上农民缺乏组织,市场信息不足或信息歪曲,使他们利用市场信息有效指导生产的成本过高,生产经营活动难以避免盲目性。对普通农民而言,市场交易成本已经远远超出单个家庭的承受能力,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农民要么选择被动地接受,要么仍然回到封闭的自产自用状态,远离商品生产,从而使经营主体停留在小农状态。

3. 土地经营规模限制了农业资本投入,农业得到的金融资本支持匮乏。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正在变成活劳动投入成本比例过高的劣势,导致中国农产品的成本水平高于世界其他农产品主要出口国,影响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 以后,中国农业将面临更严峻的竞争。

4. 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低,难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农民最为基础的经济权利仍然受到以集体所有者名义的各种非法干扰和侵蚀。尽管农民在土地使用权及收益剩余控制权方面,比改革前的生产队大大地扩展了,但是广大农户仍然无法拒绝以集体所有为由对土地收益剩余控制权的恣意分享,即以各种名目对农民实行的摊派。这已成为影响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严重障碍。

此外,在集体经营层方面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集体与成员间权益关系不明确,集体内部产权不清、政企不分、法律地位不明确、管理混乱且缺乏有效监督等,致使集体内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农村经营模式创新的基本思路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进一步扩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财产权力。一方面通过较为严格的产权维护农民利益,另一方面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第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市场和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通过制度创新,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包括给予资金支持、创造生产经营环境、正当权益的保护等等。第三,深化农村税费改革。通过降低并逐步取消农业税以实现税负公平,减轻农民负担,增强农业竞争力。第四,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 1.2 亿人,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1/4。1997 年以后,靠“离土不离乡”方式大量吸引农村劳动力的乡镇企业出现颓势,完全靠现有城市转移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也不太现实,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应该立足于农村消化剩余劳动力。

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为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奠定了长期、稳定的制度基础,确定了目标,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合理与否主要受制于制度。适宜制度导致农民的理性供给行为,制度悖论或不适宜制度导致农民的非理性行为。”“适宜制度一般产权结构明晰,交易费用较低,激励机制和监督机

制比较好;而不适宜制度一般具有产权结构模糊,交易费用高,激励机制差的特点^[6](第124页)。”下一阶段,要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结合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在经济转轨期的改革进程和趋向,及其对我国农村经济实际运行绩效的分析和评价,按照建立“适宜制度”的基本思路,进行农村经营模式创新。

笔者认为,在经济转轨期,创新中国农村经营模式的基本思路是:尊重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在深入研究农业产业链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继续努力:一是在家庭田间生产环节,以降低监督成本为目标,继续赋予农民长期土地使用权,稳定农业生产,增加农民直接收入;二是在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环节,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为目标,通过引进有实力的投资主体,以企业为龙头,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三是在农业公共服务环节,以集体和政府为主体,通过公共投入和引导等方式,加强宏观调控,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良好的生产环境、技术环境和市场环境,并积极协调农业产业链上各利益主体的关系,解决农业生产领域的“市场失灵”问题。

四、实践农村经营模式创新的基本建议

(一)以农业产业链为纽带,理顺经营职能

作为产业经营活动,农业产业经营同样有自己的产业链,同样具有“投入—生产—研发—营销—再投入”等基本环节,农业产业经营活动也同样是各经营主体以及政府间的相互博弈。根据农业产业链以及农村经营活动的时间、场所、参与对象、影响范围等基本特点,按照进行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强弱程度进行分析,可将农村经营活动分为:(1)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指农户的田间生产经营,又可细分为日常生产投资、日常生产经营决策、日常经营结算、日常活劳动投入等);(2)科技活动(主要包括农业科学研究、农业技术推广等);(3)市场营销活动(主要包括市场信息管理、新产品开发、农产品深加工、市场销售、市场风险控制等);(4)资产管理活动(主要指农村公共资产管理等);(5)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大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6)农村金融服务。

传统农村经营活动的主体主要包括:生产者(普通农户和村集体)、消费者、市场和政府。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走产业化的道路,这是被世界农业发展史所证明的事实。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产业链上经营活动的主体则变为农户、涉农企业和政府。农民是生产的主体,其主要职能是根据企业的要求提供农产品原料生产。农民要从各方面提高自身素质,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成长为具有竞争力的经营主体。企业是经营的主体,其职能主要是从事农产品的经营、加工、科技开发、信息以及市场的定位、培育和拓展等工作,帮助农民搞好种养业,对农户的生产过程进行跟踪管理,技术指导,搭建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桥梁。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第一,创造安定的生产经营环境和保护农民正当权益;第二,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信息、技术、资金,为科技成果的转化创造条件。积极进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为农村劳动力和农产品走出农村,走进市场提供政策保证,为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培养龙头企业;第三,积极引导和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二)以产权清晰为基础,理顺经营思路

从产权视角来看,大公社式的集体生产无法克服监管困难。一是技术性因素,即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困难,二是制度性因素,即产权残缺导致对监管者的激励不足。这种产权结构直接导致农业监管者和劳动者两方面积极性的损失。实行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后,在农产品生产环节,单个家庭作为一个完全清晰的产权主体成为了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从而在其承包经营范围和期限内完全节约了劳动生产的监督费用。当然,这种模式也是以牺牲规模经济换取对劳动激励的增加。事实证明,降低规模经济引起的效益损失可以被劳动激励增加的部分抵消还有余,农村经营体制的变革事实上提高了总的生产力水平,实现了帕累托改进,这也是以家庭经营为核心的农村双层经营模式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但是,从农业生产的整个产业链来看,农业的家庭小生产却没有通道与农产品的大规模分配相联结。家庭作为经营单位既没有能力从事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也没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必须的基础设

施建设,更不可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公共服务等。然而,恰恰是在这些环节,更加需要发挥大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更加需要建设大市场、实现大流通以节约高昂的市场交易费用。

当前,农村双层经营模式还仅仅是在农业产业链的初始环节——农村家庭的田间生产环节,通过降低生产监督成本,实现了激励相容,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因此,下一步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实践的突破口应该放在以产权清晰为基础的统一经营上。通过建立农村家庭、涉农企业、集体和政府利益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把重点放在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环节,以企业为龙头,建立大市场和大流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从而整体提高农业的经济水平,并最终通过良好的协调机制,使农业产业链上的各利益关联方都能享受到农业产业整体利益的提升。

[参 考 文 献]

- [1] 陈宗胜,等. 中国经济体市场化进程研究[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2] 林毅夫.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3] 毕世杰. 发展经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4] 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的发展[C]. 中国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 上海:三联书店,1992.
- [5] 罗必良. 经济组织的制度逻辑[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
- [6] 郑凤田. 制度变迁与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M]. 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
- [7] 周其仁. 产权改革与新商业组织——中国与俄罗斯农业改革的一个比较[J]. 国际经济评论,1997,(7).

(责任编辑 邹惠卿)

Rural Management Manner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volution Path, Performance and Institutional Renewal

XU Tao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XU Tao (1972-),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regional science,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enterprise theory.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ural two-layer management manner based on family tenant management system is in practice. The disadvantages of this manner lie in difficult land leasing, small management scale, narrow market relation, weak risk resistance, agriculture investment's shortage and low efficiency in land use etc. In order to develop rural economy, management innovation is necessary and the breakthrough is to unify management based on property clarification and to build cooperativ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s composed of rural families, concerned enterprises, rural cooperatives and government.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agricultural product 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ial sections, large market system and big commercial circulation guided with large firms be built as well, and thus to realize scale economy.

Key words: rural; evolution path; performance; institutional renewal